

# The Dual Predicament of the Been-to Intellectual and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Heart of Redness*

YAO Xinyue   WANG Wenxia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24, 2025

Accepted: August 21,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5

**To cite this article:** YAO Xinyue & WANG Wenxian. (2025). The Dual Predicament of the Been-to Intellectual and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Heart of Rednes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5(4), 074–08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0.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5.0504.010>. p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A History of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Grant No. 19ZDA296).*

**Abstract:**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Africa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 provides a unique context for re-evaluating colonial legacies and exploring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aths. Zakes Mda’s seminal novel, *The Heart of Redness*, uses the returning intellectual’s specific dilemma to illuminate African elites’ dual predicaments of cultural identity crisis and structural reintegration challenges. Moving beyond a simplistic critique of Western developmentalist discourse, the novel explores how the Been-to intellectual transforms diasporic experience into practical, localized wisdom, reconstructing it through a text grounded in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athways. Through its powerful ethos of local rootedness, community agency,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ecological harmony, Mda’s novel provides more than a case study in African diaspora writing. It establishes an essential literary framework for decolonizing the very imagination of Global Southern communities.

**Keywords:** Zakes Mda; *The Heart of Redness*; Been-to diaspora; Been-to intellectual; indigenous development path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s:** YAO Xinyue is an M. A.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xinyue-yao@foxmail.com. WANG Wenxian is a Ph. D.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Sino-foreign literary relations. Her email address is 17862513884@163.com.

# 《紅色之心》中『賓士知識分子』的雙重困境 與本土發展路徑

姚心悅 王文嫻

上海師範大學

**摘要:**後種族隔離時代南非的社會轉型,為反思殖民遺產與探索本土發展路徑提供了獨特語境。重要代表作家紮克斯·穆達的小說《紅色之心》通過知識分子歸國困境的鏡像敘事,揭示了非洲精英群體普遍面臨的文化認同危機與結構性融入難題。小說超越對西方發展主義話語的簡單批判,著力呈現本土知識主體如何將流散經驗轉化為在地實踐智慧,並以文本形式對其進行基於本土發展路徑的創造性重構。穆達的文學實踐不僅貢獻了非洲流散書寫的獨特個案,其蘊含的『立足本土、社區主導、文化自信、生態和諧』理念,為南方社群想象的去殖民化實踐提供了重要的文學參照。

**關鍵詞:**紮克斯·穆達;《紅色之心》;賓士流散;賓士知識分子;本土發展路徑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英語文學史』(項目編號:19ZDA296)

## 一、引言

南非著名作家紮克斯·穆達(Zakes Mda, 1948-)以其劇作、小說、詩歌和繪畫蜚聲國際,是南非英語文學的代表人物。穆達的歷史小說《紅色之心》(*The Heart of Redness*, 2000)採用雙線敘事結構,巧妙交織19世紀科薩族『殺牛運動』(Xhosa Cattle-Killing Movement)的歷史悲劇與1994年新南非誕生之際海濱村落克羅哈(Qolorha-by-Sea)圍繞『發展』議題再現的歷史遺風<sup>①</sup>。小說呈現了村民的信仰衝突和發展道路之爭,並聚焦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兩位非洲知識分子希米亞(Ximiya)與卡瑪古(Camagu)的雙重困境和破局方案。近幾年,國內學者對穆達作品的關注度日益提升,研究視角涵蓋跨語際性、民俗書寫語境、後殖民文化混雜性<sup>②</sup>以及文學倫理學批評。然而,現有研究在理論工具的自主性、文本核心命題的聚焦度以及發展路徑的建構性方面,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國外學者邁克·基薩克(Mike Kissack)和邁克爾·泰特薩德(Michael Titlestad)將卡瑪古界定為愛德華·W. 薩義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筆下的『世俗知識分子』(Secular Intellectual)<sup>③</sup>,未對比分析希米亞與卡瑪古的異邦-本土位移歷程如何導致其歸國困境,更未體現他們身為非洲知識分子與其他知識分子的異質性;蓋爾·芬徹姆(Gail Fincham)<sup>④</sup>和哈里·塞瓦爾(Harry Sewall)<sup>⑤</sup>已關注到卡瑪古的合作社實踐,但未系統提煉卡瑪古的『本土發展路徑』為破解西方現代化發展模板提供的理論價值。希米亞與卡瑪古作為『賓士知識分子』(Been-to Intellectuals)的典型,其歸國歷程深刻揭示了該群體普遍存在的『文化認同撕裂』與『社會結構性排斥』的雙重困境。穆達不僅對此困境進行了生動刻畫,更借『卡瑪古創立合作社』這一情節,為非洲知識分子群體探索了破除困境和解構西方發展主義迷思的可能路徑。



## 二、『本土知識分子』的類型學建構

1994 年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標誌著南非步入充滿希望與挑戰的民主轉型時期。穆達的《紅色之心》以此時代節點為背景，開篇即以『懷疑派』邦科 (Bhonco) 長老之女希米亞的中學校長就職宴拉開序幕。希米亞曾主動赴美國進行為期 6 個月的留學，先後獲得教育學學士學位及英語教學證書，歸國後擔任克羅哈中學校長。與之相對，另一位主角卡瑪古則因種族隔離制度被迫流亡美國長達 30 年，其間獲得傳播與經濟發展博士學位，曾為國際組織工作。歸國後，卡瑪古在約翰內斯堡求職屢遭挫折，體會到新南非權力結構對歸國精英的制度性排斥，最終輾轉來到克羅哈海濱村落。這種資源分配不公的局面，加之其文化疏離感，讓卡瑪古成為故土上無所歸依的賓土流散者。『賓土』是對『Been-to』(去過)的音譯，『賓土流散』也被稱為『異邦—本土流散』，指曾實現地理位置徙移至發達國家學習、生活，後又回歸故土的流散類型。『四大流散理論』<sup>⑥</sup>提煉『異邦流散、本土流散、殖民流散和賓土流散 (Been-to Diaspora)』四大流散類型，為理解非洲文學中的流散現象提供了本土化分類框架<sup>⑦</sup>。穆達出生於種族隔離時期的索韋托 (Soweto)，父親作為泛非大會 (PAC) 長老，因政治迫害被迫流亡萊索托 (Lesotho)，穆達 14 歲時隨父踏上漂泊之路。作為長期定居美國的『異邦流散』作家，穆達曾回到南非開普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其創作植根於自身的『賓土流散』經驗<sup>⑧</sup>。這種多重流散背景使穆達對筆下人物的流散境遇具有深刻洞察。希米亞與卡瑪古均經歷『南非—美國—南非』的地理位移循環，從地域的視角來看，是『賓土流散』的典型。希米亞與卡瑪古均有海外學習經歷，流散經歷和教育背景塑造了『賓土知識分子』對異邦—本土的認知和回應方式，他們屬於『賓土流散者』中的『賓土知識分子』，就是曾離開非洲接受西方教育，之後又回歸本土的知識分子群體。

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與使命，歷來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核心議題。然而，在經歷去殖民化與艱難現代化探索的非洲大陸，如果沿用傳統對『知識分子』群體進行定義，顯然陷入了闡釋困境。班達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 (Philosopherkings)，真正的知識分子活動不是追求實用的目的，而是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sup>⑨</sup>。這一定義顯然脫離實用目的，也不符合非洲的現實環境。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傳統知識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和『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指代代從事相同工作的教師與行政官吏，後者指與階級或企業相關的工業技術人員、政治經濟專家與新文化的組織者等<sup>⑩</sup>。葛蘭西的分類雖更細緻，但依舊不適合非洲各國國情，忽略各個地域知識分子群體的代際差異。與前兩者相比，薩義德的定義更加凸顯知識分子的智性特征。他認為知識分子是以代表藝術為業的個人，不管那是演說、寫作、教學或上電視。知識分子一定要令人尷尬，處於對立，甚至造成不快，而且不能輕易被政府或集團收編<sup>⑪</sup>。薩義德對知識分子批判性的強調，與非洲語境下建設性實踐的迫切性構成辯證張力。非洲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曾赴西方求學後又主動回歸故土的『賓土知識分子』，其面臨的歷史任務、生存境遇和行動策略以及與本土社群和新生國家權力的關係，呈現出與西方主流社會模式結構迥異的複雜圖景。『賓土知識分子』的特質在於既需保持對權力結構的批判距離，亦需將知識轉化為社群賦能的工具，二者統一於本土發展的歷史使命中。從非洲各國的國情出發，『賓土知識分子』不僅是批判者，更是被期待的建設者，其流散常非被迫放逐，而是尋求知識後自覺的還鄉，其價值不僅在於言說真理，更在於將知識轉化為推動社群發展、國家復興的在地實踐。這種理論與現實的錯位，暴露了現有知識分子話語中深藏的西方中心主義預設與歷史語境敏感性缺失，難以闡釋非洲知識分子的歸國實踐及其建設性角色。『賓土知識分子』是一種強調知識還鄉、批判性實踐生根與社群可持續發展探索的『建設性知識分子』理論雛形，旨在為超越西方中心的知識分子理論霸權，重構契合全球南方發展倫理的主體性話語提供關鍵的文學證詞與學理路徑。

希米亞與卡瑪古的流散動因差異成為理解其歸國後文化立場與實踐選擇差異的關鍵。『賓土知識分子』可依據初始流移動因分為兩類<sup>②</sup>：第一，主動流散型工具性回歸，即以尋求知識、機遇為目的主動赴異邦，回歸帶有明確的工具性目的。希米亞即屬此類，其短暫的留學經歷旨在提升個人資歷，歸國後擔任校長。第二，被迫流散型創傷性回歸，即因政治迫害、戰爭等不可抗力被迫離境，回歸常伴隨創傷性體驗與文化疏離感。卡瑪古長達 30 年的流亡源於種族隔離的政治壓迫，其回歸充滿建設故土的理想，卻遭遇現實的冰冷排斥。二者雖同屬『賓土知識分子』，但初始動因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預設了其回歸後的文化立場與身份認同。被迫流散者往往保留較強的本土文化情結及批判性視角，主動流散者則更易接納或內化西方文化價值觀。希米亞與卡瑪古在克羅哈相遇後，在發展理念和文化認同上產生激烈沖突，正是流散動因差異導致的必然結果。儘管現實存在交叉和轉化，但此理想類型劃分有助於理解小說人物的核心差異。穆達通過塑造希米亞與卡瑪古這兩位流移動因迥異的『賓土知識分子』形象，不僅豐富了非洲流散文學的人物畫廊，更借此叩問一個核心命題：身處民主轉型時期的南非，知識分子應如何定位自身並利用跨文化經驗服務於本土發展？

### 三、『賓土知識分子』的雙重困境

希米亞與卡瑪古歸國後均遭遇了身份認同與職業發展的困境，能否破除困境取決於知識分子對西方話語下知識與權力共生關係的識別。法國後現代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Jean-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關於知識與權力關係的論斷指出：『誰決定知識是什麼？誰知道應該決定什麼？……這種被稱為科學的語言和另一種被稱為倫理政治的語言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兩者都來自同一個地方，或者說來自同一個『選擇』，它的名字叫西方。』<sup>③</sup>這揭示了西方知識體系隱含的權力結構及其普遍化訴求，對於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的『賓土知識分子』而言，這種知識-權力的共生關係構成了其身份困境的深層根源。在西方語境下，他們常被視為文化上的『他者』或邊緣人，遭遇隱性的種族化困境。在本土語境中，西方教育背景又可能使其被質疑為殖民思維的代理人，面臨文化忠誠度的拷問。希米亞與卡瑪古作為『賓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回歸本土後的遭遇生動呈現了後殖民語境下內外交織的雙重困境。

希米亞作為『主動流散型工具性回歸』的典型，其困境集中體現為文化認同撕裂與自我殖民傾向。她對自身在克羅哈的校長職位深感不滿，向往都市的政府職位：『窩在這個村裏當老師，工資少得可憐。我要走，我必須離開這個村莊。』<sup>④</sup>不同於對故鄉的鄙夷，她對美國的推崇近乎神話，稱之為『童話般的國家』、『世界上最好的國家』（75–76）。這種心態外化於其審美與文化批判，她視本民族傳統科薩服飾為『讓人難堪的東西』，認為父母穿著民族服飾是『落後的生活方式和異教信仰』，並試圖用歐洲時裝改造他們，使其成為『像她一樣開悟的人』（51）。後殖民理論家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 1925–1961）曾犀利地剖析這種『被殖民知識分子』的心態，指出他們『渴望投入西方文化，努力把歐洲文化變成自己的東西，成為最極致的同謀者』<sup>⑤</sup>。希米亞對傳統服飾的恥感，直接源於殖民傳教士灌輸的二元對立敘事：『傳教士曾教導他們，鄙棄異教徒的卡卡短裙是一種文明的標誌。異教徒就是那些蒙昧無知，仍然用紅色赭石顏料塗抹身體裝飾自己的人。』（65）這種敘事將『現代化』等同於接受以歐洲為中心的『正確』價值觀，希米亞渴望利用西裝等『白面具』式西方符號掩蓋其文化身份的『黑皮膚』。這種在兩種文化中的撕裂感使希米亞在與村落『篤信派』的文化權力交鋒中失勢，並在與象征本土自然精神的女性庫克茲娃（Qukezwa）的情感角逐中落敗。穆達通過希米亞的困境表明：即便是『主動』流散，一旦處於殖民遺產與不平等的全球知識權力結構，其行為也蘊含著被迫內化西方標準的悲劇性。

與希米亞所代表的深陷自我殖民的『主動流散型』不同，該類型中的另一部分知識分子則可能走向覺醒





與回歸。尼日利亞作家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1977-) 筆下《美國佬》(Americanah, 2013) 的女主角伊菲麥露 (Ifemelu) 就是這種典型。伊菲麥露曾經也通過學習美式英語口音來扮演正宗『美國佬』, 視美國為實現夢想的『溫床』。直到 13 年的流散歷程中文化差異、生活困境與隱性種族歧視的經歷重塑了她的人格, 並促使她對自我、種族和家園等議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伊菲麥露屬於『長期工具型』回歸, 她放棄了普林斯頓大學研究員的高薪職位, 她的歸來有明確的建設家鄉意圖與使命感。伊菲麥露創建博客『拉各斯的微小救贖』, 在上面刊登拉各斯的社會現象與需要傳播給公眾的知識, 呼籲各位『賓土知識分子』放下對拉各斯的抱怨<sup>⑩</sup>。伊菲麥露意識到, 『賓土知識分子』有能力將所學知識用於促進家鄉的經濟發展和提高同胞認知水平。伊菲麥露因在美國的時間更長, 經歷的隱形歧視與生存危機更深, 所以比希米亞有更濃厚的故土情懷與解構『美國神話』的能力, 她的歸來為深陷自我殖民泥沼的『賓土知識分子』提供了重回本土的可能性。作為同屬『主動流散型工具性回歸』的賓土知識分子, 伊菲麥露的博客實踐與希米亞的崇美心態形成互文。與伊菲麥露通過數字媒介賦權本土不同, 希米亞的教育者角色本可在村落學校場域實踐文化傳承, 但她選擇將『現代化』等同於逃離鄉土, 暴露其知識轉化能力的匱乏。

不同於希米亞代表的『主動流散困境』, 卡瑪古作為『被迫流散型創傷性回歸』的代表, 其困境主要源於新南非社會轉型期的結構性排斥。卡瑪古的學術素養遠高於希米亞, 文化立場呈現鮮明的批判性, 這種差異源於二者流散經歷的性質與深度。當希米亞沈醉於『美國童話』時, 卡瑪古清醒地戳破幻象: 『美國沒有什麼好東西, 有的只是種族偏見和對其它國家的流氓行徑。』(76) 這並非道德批判, 而是卡瑪古 30 年流亡生涯的切膚之痛。與希米亞對美國的推崇不同, 卡瑪古對美國的批判源於自己深陷另一維度的身份認同困境, 即他認同本土, 本土不完全接納他。這就使卡瑪古處在薩義德筆下『流亡者的中間狀態』, 既非完全與新環境合一, 也未完全與舊環境分離, 而是處於若即若離的困境<sup>⑪</sup>。卡瑪古擁有頂尖學歷和豐富的國際經驗, 懷抱建設新南非的熱忱歸來, 卻在約翰內斯堡的求職中屢屢碰壁, 因『學得太多而受到懲罰』。他發現『企業界不需要合格的黑人, 他們更喜歡沒有經驗的黑人。那些黑人非常樂意被安置在平權行動的辦公室裏工作, 當黑人賦權運動的成果展示品。』(34-35) 本土權力集團甚至指責他『不愛國』, 稱其『在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為了美帝國主義棄它而去』。目睹轉型期的社會亂象與『每天早上街道都躺著好多死屍的事實』, 卡瑪古感到巨大的失落與疏離。本以為新南非會是他大展身手的一片天地, 將他在海外學到的知識與工作經驗報效祖國, 卻發現自己成了自己國家的流亡者, 甚至『已經把手提箱收拾好, 明天就要開始第二次流亡』(30-31)。卡瑪古的困境暴露了新南非轉型期的深層矛盾, 反殖民話語可能異化為身份政治的門票, 經濟賦權淪為表演性的櫥窗展示和特權分贓的工具。像卡瑪古這樣具備批判意識與國際視野的知識分子, 反而成為被西方和本土權力結構雙重排斥的『棄民』。

希米亞的自我殖民與卡瑪古遭遇的結構性排斥, 共同勾勒出『賓土知識分子』所陷的雙重困境圖譜。此困境的根源在於西方知識-權力的普遍化神話與本土轉型期權力結構的排他性。他們的經歷證明, 知識分子的出路既非全盤擁抱『美國夢』, 亦非退守僵化的『封閉傳統』, 而要尋求一條植根本土、面向未來的第三條道路, 以幫助個體和社群『從殖民情境所產生的情結軍火庫中自我解放』<sup>⑫</sup>。卡瑪古在克羅哈的發展實踐, 正是對這種破局方向的積極探索。

#### 四、『賓土知識分子』的本土發展路徑

『賓土知識分子』肩負著利用知識反哺本土和引領社群發展的歷史責任。小說呈現了『代表新殖民主義邏輯的賭場開發、陷入文化異化陷阱的文化旅遊與卡瑪古以『本土發展路徑』為核心的合作社』三種村落發展的典型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國總統哈裏·杜魯門 (Harry Truman) 向美國和全世界呼籲, 要解決全

球『欠發達地區』的問題,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這一意願在各國取得了霸主性的地位。『發展』之風也席卷至南非。後發展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阿圖羅·埃斯科瓦爾(Arturo Escobar, 1951-)的研究表明,發展的話語和戰略帶來的是大規模的欠發達和貧窮,是難以言說的剝削和壓迫<sup>①</sup>。以歐美為代表的現代化發展路徑,並不一定適合第三世界國家。第三世界國家的國情也說明,罔顧現實境況、照搬西式發展道路,最後只會南轅北轍,適得其反。黑人抗議領袖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提出,『黑人種族的救贖將取決於其有才華的十分之一成員』(The Talented Tenth),他們必須通過高等教育獲得領導能力,進而喚醒民眾的集體力量<sup>②</sup>。卡瑪古作為同時掌握西方現代知識體系與本土智慧的『中間人』,戳破西方世界『發展神話』的重任降至其身。

賭場開發模式代表新殖民主義,其核心邏輯是複製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種模式承諾就業與繁榮,本質上是資本與外部權力對本土生態資源與生計方式的掠奪性占有,此方式被以希米亞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所推崇。希米亞稱反對賭場開發的『篤信派』是『多愁善感的想要保護鳥類、樹木和過時的生活方式的老傻瓜』,賭場的建設是『文明的發展』(79)。賭場開發承諾的就業與繁榮,吸引了大批『懷疑派』的村民,他們期望『成為發展項目實施中可領取酬勞的勞動者』。然而,象征本土生態智慧的庫克茲娃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片海將被遊客、遊船和水上運動占用。這些婦女將再也不能趕海。即使是在建設賭場期間,村裏也幾乎沒人能獲得工作機會。』(123-124)戴維·梅澤爾(David Mazel)關於『環境的再現都離不開與權力相關的建構』<sup>③</sup>的觀點在此得到印證,『懷疑派』對『美國救星』的幻想忽視了項目背後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與此同時,商人道爾頓推行的『文化旅遊』項目則陷入文化自我異化的陷阱。道爾頓僱傭村民穿著傳統服飾,表演磨小米、塗赭石等刻板化場景,供白人遊客獵奇消費。(114)穆達在《祖魯人在紐約》(The Zulus of New York, 2020)中對扮演『野蠻祖魯人』的批判<sup>④</sup>同樣適用於此。卡瑪古對道爾頓的『文化旅遊』強烈反對:『科薩人不是博物館的藏品。像所有的文化一樣,他們的文化是動態的。』(297)這種將活態文化標本化和商品化的模式,本質上是迎合『他者凝視』的自我異化,是一種文化自卑的過度補償<sup>⑤</sup>,不僅無法帶來可持續的尊嚴與發展,反而固化了對非洲文化的刻板想象。

合作社模式的本質是『賓士知識分子』將西方知識體系與地方性智慧創造性結合的在地實踐。卡瑪古將克羅哈申報為國家遺產,通過民主推選的管理委員會,確保村民集體所有權,采用天然材料建設生態友好的背包客旅館。這一實踐顛覆了西方發展主義模板,通過社區賦權、技術適配和文化活化的三維整合,實現了本土性的創造性重構。首先,卡瑪古積極與地方及省級官員交涉,揭露主流『黑人賦權』政策往往『只賦權給少數被選中的人』(285),強調唯有社區主導的發展模式,才能確保村民真正共享經濟成果,實現發展的自主性與可持續性。其次,合作社建設中,太陽能供電等現代技術與天然建材傳統智慧並存。卡瑪古不僅從思想上幫助村民理解享有技術發展紅利的正當性,更從實操層面耐心解釋太陽能原理和互聯網營銷力量,調和了現代技術與本土生活方式的矛盾,體現了『適用技術』的理念。這種結合本土實況的實踐高度契合非洲大陸《2063年議程:我們想要的非洲》的第五條倡議:『讓非洲擁有強大的文化認同、共同傳承、共享價值觀和道德觀。』<sup>⑥</sup>卡瑪古呼籲人們在新南非背景下,通過邀請遊客加入現代科薩人的生活場域,共建動態文化。他東奔西跑,跟女人一起去采收貽貝和牡蠣、縫裙子和串珠子,將科薩服飾工藝轉化為當代經濟資源,激活傳統文化活力。過去,工業化和農業發展項目不僅僅掩蓋了婦女作為生產者的角色,還企圖使她們的附屬地位永久性地持續下去。村莊的女性作為赭石製作者與海洋資源管理的傳承者,其生態知識構成合作社的文化內核。穆達借此暗示,非洲婦女的本土知識是抗衡發展主義的重要資源。在現實中也有成功案例,如肯尼亞女性利用本土生態知識協力恢復沿海森林<sup>⑦</sup>。在《與黑共舞》(She Plays with The Darkness, 2004)中,穆達開篇便指出丈夫外出打工,妻子和孩子留在鄉村無人問津的生活窘境<sup>⑧</sup>。在《紅色之心》中,穆達借卡瑪古的積極行動給這一困境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很快,這些婦女掙的錢就會超過她們在礦山工作



的丈夫。』(192)合作社項目既發揚了科薩傳統服裝,又為當地婦女爭得經濟自主權。自此,基於社區共有、技術適配和文化活化的本土發展模式初具雛形。

非洲 Ubuntu 哲學所強調的『我的人格和他的人格緊緊相連,密不可分』的『共同體倫理』<sup>②</sup>為合作社模式提供了深厚的倫理根基。《紅色之心》中體現出的『共同體倫理』是根植非洲地緣與歷史、文化特殊性的發展方式,其表征便是合作社模式。博茨瓦納作家貝西·黑德(Bessie Head, 1937-1986)的小說《權力問題》(*A Question of Power*, 1973)中就有對生產型合作社模式的詳細描寫:『他們成立了學校青年發展工作小組,學習有關建築、木工、電力、印刷、製鞋、農耕和紡織等技術;學校工作順利開展後,尤金就把注意力投向了貧窮的文盲村民。他心裏想的是地方工業的發展。』<sup>③</sup>相較於傳統生產型合作社,文化型合作社實現了生態-文化-經濟的協同創新。穆達筆下的合作社實踐超越了黑德筆下側重於技能培訓和手工業的生產型合作社,開創了以本土生態系統和文化資源為基礎的參與式生態旅遊模式。這種模式不僅為小說中的克羅哈村描繪了希望圖景,其蘊含的『立足本土、社區主導、文化自信、生態和諧』的發展理念,也為全球南方社群解構西方發展主義迷思與探索多元現代化道路提供了寶貴的文學啟示。

合作社形態的本土化譜系昭示,『賓士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根治地方性知識脈絡,開掘兼具文化適應性與社群福祉的發展變體。對於卡瑪古合作社的後續發展情況,穆達以開放式結尾,將值得深思的問題留給更多賓士知識分子們與讀者們。20 世紀 50 年代後半期和 60 年代是非洲國家的獨立浪潮。通常有兩種經濟模式: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當這些新政府探索資本主義時,往往帶有『新殖民主義』的色彩。不可否認的是,想要實現非洲社會主義仍然面臨著許多經濟和社會挑戰<sup>④</sup>。後發社群的發展本就道阻且長,《紅色之心》通過卡瑪古的困境與路徑探索為更多現實中的賓士知識分子們提供了實踐範式與展望。雖然希米亞是主動流散者的失敗樣本,但卡瑪古式探索在現實中仍有成功案例,穆達本人就積極參與『粉色山脈』養蜂項目<sup>⑤</sup>,昭示了『賓士知識分子』投身本土實踐與重塑發展路徑的可能。這種本土化探索與中國對非合作的『造血式』賦能理念形成跨大陸呼應。近年來,中非農業合作以『中國式現代化』為紐帶,凝聚全球南方社群的力量,為非洲減貧事業作出巨大貢獻<sup>⑥</sup>,攜手开辟了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之外的本土路徑。

## 五、结语

《紅色之心》的文學價值,不僅在於穆達對後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知識分子歸國困境的深刻呈現,更在於他通過小說敘事,敏銳地捕捉到『賓士知識分子』群體在文化認同與發展理念上的內在撕裂,主動建構並論證了一種超越『西方發展主義』迷思與『文化本質主義』桎梏的本土發展路徑範式。值得注意的是,希米亞與卡瑪古所經歷的『異邦-本土』位移中的文化疏離、身份焦慮與發展路徑抉擇,並非孤例。『賓士知識分子』是世界文學中反覆書寫的主題。無論是因歷史創傷被迫流亡,還是為追尋機遇主動遠行,抑或在兩種文化間難以自處、進退失據,知識分子在全球化浪潮中尋求身份定位與本土價值實現的困境具有普遍性,構成了後殖民時代一個極具探討意義的複雜命題,揭示了流散經驗所賦予的雙重視角如何轉化為在地實踐的關鍵資源。小說最終推崇的,是一種根植於社區賦權、技術適配與文化活性化三維互構的共生發展倫理。這一倫理內核,既是對非洲 Ubuntu 哲學『共生共在』理念的當代創造性轉化,也以其對地方性知識的尊重與活化,為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多元可能性提供了文學想象與參照範本。穆達的創作實踐有力證明,非洲文學絕非被動反映社會矛盾的鏡像,更是積極參與本土知識生產、解構霸權話語並構想替代性未來的能動力量。其作品所蘊含的『紮根性解構』與『共生性建構』智慧,將持續激發關於後殖民世界發展正義與文化主體性的深層思考。





## 注釋

- ①『殺牛運動』為1856-1857年發生於南非東開普地區的歷史事件。科薩族少女先知農卡烏絲(Nongqawuse)宣稱『祖先將驅逐白人殖民者,但需先屠殺所有牲畜、毀棄莊稼』,導致科薩社會分裂為『篤信派』(Believers,堅持傳統預言)和『懷疑派』(Unbelievers,主張接受殖民改革)。信徒大規模宰殺牲畜後預言未應驗,引發大饑荒,數萬名科薩族人死亡。此事件被穆達用作小說《紅色之心》的歷史隱喻框架。在1994年的克羅哈村,村民依然分為兩派:以澤姆(Zim)為代表,堅守科薩傳統生活方式,反對賭場開發等現代化項目,認為這會破壞生態和文化根基;以邦科(Bhonco)為代表,主張通過旅遊開發推動經濟進步,認為傳統阻礙發展。
- ② 蔡聖勤,蘆婷:《歷史重構與文化雜糅:穆達小說之後殖民解析》,《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頁152-159。
- ③ Mike Kissack & Michael Titlestad. (2009). Invidious interpreters: The oost-colonial intellectual in *The Heart of Redness*. In D. Bell & J. U. Jacobs (Eds.). *Ways of writing: Critical essays on Zakes Mda*.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pp. 149-169.
- ④ Gail Fincham. (2009). Community and Agency in *The Heart of Redness* and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In D. Bell & J. U. Jacobs (Eds.). *Ways of writing: Critical essays on Zakes Mda*.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pp. 191-207.
- ⑤ Harry Sewlall. (2009). The Ecological Imperative in *The Heart of Redness*. In D. Bell & J. U. Jacobs (Eds.). *Ways of writing: Critical essays on Zakes Mda*. Scottsville,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Press, pp. 207-229.
- ⑥ 朱振武:《中外文學的傳播互鑒與歸異平衡——以『中國非洲文學學』的建構理路為中心》,《外國文學研究》第1期,2025年第1期,頁50-58。
- ⑦ 程雅樂,朱振武:《中國非洲文學學的構建理路——朱振武教授訪談錄》,《山東外語教學》,2023年第5期,頁1-9。
- ⑧ Zakes Mda. (2011). *Sometimes there is a Voi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⑨⑩⑪⑫ 愛德華·W. 薩義德(著),單德興(譯):《知識分子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頁26-61。
- ⑬ 需強調的是,此分類模型基於《紅色之心》的文學表征提煉,體現穆達對後殖民知識分子的典型化書寫。現實中,主動流散者可能因異邦受挫轉向創傷性回歸,如《美國佬》(*Americanah*, 2013)中的伊菲麥露(Ifemelu);被迫流散者亦可能工具化利用流亡資源。本文聚焦小說人物的理想類型,旨在揭示動因差異如何導向不同的文化立場與實踐選擇。
- ⑭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著),車槿山(譯):《後現代狀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31。
- ⑮ 紮克斯·穆達(著),胡忠青(譯):《紅色之心》,深圳:深圳出版社2024年版,頁14。本文引用《紅色之心》均出自胡忠青譯本,以下僅標註頁碼。
- ⑯ 弗朗茲·法農(著),楊碧川(譯):《大地上受苦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頁137。
- ⑰ 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著),張雲(譯):《美國佬》,南京:譯林出版社2024年版,頁554。
- ⑱ 弗朗茲·法農(著),楊碧川(譯):《大地上受苦的人》,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版,頁25。
- ⑲ 阿圖羅·埃斯科瓦爾(著),汪淳玉,吳惠芳,潘璐(譯):《遭遇發展——第三世界的形成與瓦解》,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頁1-3。
- ⑳ Du Bois, W. E. B. (1969). The talented tenth. In B. T. Washington (Ed.), *The Negro problem*. Arno Press, pp. 31-75).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03)
- ㉑ 拜倫·卡米內羅-斯安琪洛:《深淺有別的綠色:生態批評與非洲文學》。載[尼日利亞]泰居莫拉·奧拉尼央(Tejumola Olaniyan)、[加納]阿托·奎森(Ato Quayson)(主編),姚峰、孫曉萌、汪琳等(譯):《非洲文學批評史稿(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頁908。
- ㉒ Zakes Mda. (2020). *The Zulus of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South Africa.
- ㉓ 道爾頓是南非英裔白人。他的身份認同紮根本土,他曾對計劃移民的白人宣誓:『這是我的土地,我祖先的土地,我屬於這裏。』他的文化旅遊初心為發展本土旅遊業,但難免陷入將本地婦女商品化的思維陷阱。道爾頓的形象設置體現新時代南





非白人的矛盾與掙紮。

②④ <https://au.int/en/agenda2063/overview>, 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25 日。

②⑤ [https://www.tnc.org.cn/content/details28\\_1304.html](https://www.tnc.org.cn/content/details28_1304.html), 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25 日。

②⑥ Zakes Mda. (2004). *She plays with the Darkness*. New York: Vivlia Publishers & Booksellers (Pty) Ltd.

②⑦ 德斯蒙德·圖圖(著),江紅(譯):《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34-35。

②⑧ 貝西·黑德(著),李艷(譯):《權力問題》,杭州: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2019 年版,頁 74。

②⑨ Emmanuel Akyeampong, trans. WANG Ting. (2023). African Socialism; or, the search for an indigenous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cerpt 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094-102.

③⑩ Gail Fincham. (2011). *Dance of life: The novels of Zakes Mda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Cape Town: UCT Press.

③⑪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8/content\\_6970592.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8/content_6970592.htm), 访问日期:2025 年 9 月 25 日。

(Editors: Derrick MI & Joe ZHANG)